

试论习近平的互联网思维

石 超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网络技术及其应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如何利用好互联网实现新发展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在深刻认识世情党情国情的基础上,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互联网思维。习近平的互联网思维内涵丰富, 既包括互联网战略层面的网络强国论, 又囊括互联网战术层面的网络治理论、网络安全论、网络共享论等。在网络发展的重大机遇期, 习近平的互联网思想为充分利用网络空间, 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保障; 为构建网络安全体系, 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为实现全球互联互通, 共享世界文明发展成果带来了动力。

关键词: 习近平; 互联网思维; 信息化时代

中图分类号: D 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6)06-0020-06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发表关于互联网建设的论述, 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互联网思维。习近平的互联网思维既注重把握全球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势, 同时又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丰富互联网建设的新内涵。探究习近平互联网思维对于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方向、加强与世界的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互联网思维的形成背景

自 2012 年以来, 习近平提出了许多关于互联网的论断, 显示出了党中央对于网络生态治理的高度重视。习近平互联网思维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是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形成的科学思维方式, 具有强烈的现实基础。

1. 网络技术及其应用于中国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1969 年互联网技术在美国产生, 1994 年中国开始接入国际互联网。20 年来网络技术及其应用深刻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于互联网技术有着深刻的认识, 习近平指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 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 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 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 极大地提

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中国正处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1]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对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政府管理、推动社会文化事业建设等都有巨大作用。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 国际国内局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 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愈发明显, 科学技术的作用明显加强, 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的竞争日趋激烈, 思想文化渗透层出不穷。从国内来看,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期, 各种社会利益相互交织, 政治体制改革进入瓶颈期, 精神文明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应该说, 习近平对于国际国内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 并且力主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 力图“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 13 亿多中国人民,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2]。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互联网思维是当前我国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思维之一。

当然, 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战略机遇, 同时也具有许多消极影响, 给我国带来一系列的挑战。马克思对于其所处时代科技的异化现象曾描述到: “在我们这个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

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破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3]775}虽然我们现在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然而以网络技术为主导的现实环境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一把双刃剑。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空界限，有利于实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共享。但是由于互联网自身具有开放性、实时性、多样性等特点，决定了互联网正在成为各国意识形态较量的决战场。近年来，西方势力不断通过网络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意图通过文化渗透等方式消解我国主流价值观。对此，习近平也有着深刻认识，一再指出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必须加强网络治理，维护我国信息安全。

2. 网络时代中共执政能力建设面临新的课题

网络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政党重要的执政资源。如何运用好、发挥好互联网的作用关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水平的高低。互联网相对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来说，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传播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新时期，将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党建工作可以进一步优化党的执政环境，改进党的执政方法，丰富党的执政内容，发挥党内民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扩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4]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做好“互联网+党建”这一新模式意义重大。执政党可以通过网络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引导人们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收集人们的观点意见，有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的能力。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执政工作的电子化程度，电子办公的开展使得执政效率大大提高。而且，合理运用互联网有助于党员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提高经验水平。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享受网络技术带来的各种便利之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网络作为一个信息平台，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些真实可靠

的信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无效虚假的内容。对于执政党而言，如何正确发挥网络民主的作用，抵制网络不法行为，显得尤为重要。与现实中人们的政治参与相比，网络政治参与的成本显然要低得多，一些网民为了一己私利、一时泄愤，不加思考地在网上制造各种虚假信息、发出各种不当言论，从而带起一批非理性的网民“炮轰”政府，甚至是做出过激行为。英国学者约翰·基恩指出：“一个社会应当有一定程度的沟通自由，否则，政治权威就等于否认媒体存在的合法性；但同时，在媒体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把握好自由与控制的平衡”^{[5]3}。事实确实如此，当执政党被这些网络泄愤者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时，必然会影响其正常工作的开展。如何整治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此外，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党员的政治信仰问题也提出了巨大考验。网络时代各种社会思潮涌现，党员本应该是抵制错误思潮、弘扬主旋律的带头人，然而一些党员在网络的世界中迷失了自我，对于西方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一些思潮不能辨识，冲击了原有的价值观，做出许多违反党纪党规的行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不复存在。对于党组织造成重大危害的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现在一些所谓的网络大 V，受西方错误思想影响，肆意抹杀历史。习近平的互联网思维就是在面临一系列难题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旨在更好地利用网络，紧抓网络发展大势，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二、习近平互联网思维的主要内容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依据世界互联网发展大势，又结合中国实际发展特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互联网建设的新思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对于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

1. 网络强国论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沟通的新桥梁，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对世界网络发展大势，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以积极的心态主动融入互联网世界。为此，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从

战略层面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观提出了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要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2]网络强国论显示出了中国力争在网络领域做出一番成绩的雄心壮志，是配合我国各方面改革的重要抓手。网络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是实现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时代是一个多元竞争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竞争的过程中如何将自身做大做强是摆在每一个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6.88亿，居民上网人数已经过半。很显然，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网络大国，但是距离实现网络强国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如何建设网络强国这一问题上，习近平从五个方面做过论述，

“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2]建设网络强国事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我们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不断开拓网络发展新境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2. 网络治理论

网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在如何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方面，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观点。首先，依法治网观。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同时网络环境并非完全纯净透明，网络成为许多违法犯罪行为的潜在地。网络治理必须要做到依法治网，“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

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6]网络空间是交流、共享的平台，绝不是法外之地。

“我们应该坚持构建良好秩序，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同时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1]其次，全球治理观。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在国际舞台站稳脚跟。在网络领域也是如此，只有坚持多边合作，共同面对网络空间领域出现的各种难题，才能实现共赢。尤其是基于网络技术复杂性的特点，必须树立全球网络治理观，才能长效共存。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1]实现网络全球治理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做好克服困难的准备。习近平对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五点主张：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络安全，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

3. 网络安全论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障国家安全是每一个主权国家所追求的目标。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将我国的安全建设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今是网络信息化时代，对于国家安全而言，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其重要内容。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网络空间领域下的国家安全内容更加丰富，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生态、信息等多个领域。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体系呈现出动态性的特点。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动，网络时代的安全体系构建必须随时满足国家发展的整体需要。此外，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特点，国家安全体系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更加开放，这无疑对维护网络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时期，提升国家网络安全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虽然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

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7]维护网络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融合个人、社会、国家各方面的力量。“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8]网络具有双面性，其消极方面往往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导火索，我们必须“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8]。

4. 网络共享论

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影响着每个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进步。整个人类社会都沉浸在互联网的浪潮中，互联网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9]历史一再证明，世界是一个共同体，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实现世界共荣。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各国来说亦是如此，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不仅仅应该只惠及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而是应该让全世界共享网络繁荣所带来的成果。对此，习近平指出：

“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深化国际合作，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安全，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9]

网络共享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世界需要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即中国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世界实现和平与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与合作。处于网络时代的中国必须“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0][56]}。借助网络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影响大的特

点，我们要向世界介绍中国古老的历史、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打造中国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共享世界文明的丰硕果实，即中国如何“引进来”的问题。当今中国的发展绝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而要积极与世界接轨，学习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而网络在加强各国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相关部门必须“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1]。

三、习近平互联网思维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的互联网思维既体现出了对世界互联网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同时又结合世情国情党情赋予了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发展观，蕴含着鲜明的中国治网之道，对于我国网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为充分利用网络空间，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保障

互联网兴起以后迅速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战场，各个国家在网络空间领域的斗法层出不穷，极力通过各种方式传播本国的意识形态，试图在网络领域的竞争中占得先机。习近平互联网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我国充分利用网络空间，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马克思曾指出：“构成统治阶级的每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1][98]}这就意味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我国的渗透。当前西方国家通过文化渗透等方式试图对我国主流思想进行瓦解、腐蚀，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对此，“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

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8]习近平关于互联网的认识和论断，深刻揭示了当前我国网络发展的脉络和取向，能够有效地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观点、政治信仰，提高人们的历史认同感、社会认同感、文化认同感。

2. 为构建网络安全体系，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的互联网治理观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互联网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网络信息时代，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网络安全的威胁，各种反政府、反社会的组织、团体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打着所谓政治民主、网络自由的幌子破坏社会稳定。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了网络大国，但却还不是网络强国，不具备强大的网络软实力。从自身来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高精尖人才队伍建设迟缓、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从外部来看，来自西方国家的干扰不断，网络间谍、网络黑客频频威胁我国网络安全。习近平多次强调加强网络安全的重要性，要求“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重视新兴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6]可以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为国家安全提供了无形的“保护伞”，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态等各要素息息相关。我们的党和政府在过去已经习惯了对单一现实社会的治理模式，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全面来临，必将对我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不断提高治理水平。习近平互联网思维的形成，对于我国在新时期探索网络治理的方式、方法指明了方向，是党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新要求、新体现。

3. 为实现全球互联互通，共享世界文明发展成果带来了动力

随着网络的普及，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各国之间打破了原有的时间、空间界限，在双方遵循自愿平等的前提下可

以实现畅通自由、资源共享。习近平多次表达了中国希望在网络领域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共同促进世界繁荣的想法。2014年11月，习近平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致词时倡议：“国际社会应携起手来，不断深化交流合作，推动互联网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互联网经济繁荣发展，加强互联网技术合作共享，实现互联网安全保障有力，促进各国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增进人类福祉。”^[9]2015年12月，习近平在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时又呼吁：“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希望搭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的一个平台，共同推动互联网健康发展。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1]如果说，在互联网未产生之前，各个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已经有了初步的交流，并感受到了交流共享所带来的好处，那么网络时代的到来，则开启了全球互联互通的新纪元，有利于进一步共享世界文明的发展成果，而习近平的多次讲话都体现出了中国愿意在互联网领域加强世界合作的强烈愿望。当然，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并不意味着我国就放弃了网络治理的主动权，党和政府一再强调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在与世界互联互通的过程中，要始终牢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网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2015-12-17(1).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N]. 人民日报,2014-02-28(1).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15-11-04(1).
- [5] 约翰·基恩. 媒体与民主[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6]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3-11-16(1).
- [7] 弘扬传统友好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N]. 人民日报,2015-07-18(3).
- [8] 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强调在

- 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N]. 人民日报,2016-04-20(1).
- [9] 习近平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词强调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N]. 人民日报,2014-11-20(1).
- [10]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On Xi Jin-ping's Internet Thinking

SHI Chao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Granted that the network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s a double-edged sword,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internet is a major task that China is faced with to achieve the new developmen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Xi Jin-ping, the general secretary, has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orld, China, and the CCP, thus creating a unique thinking of Internet. XI Jin-ping's Internet thinking is abundant, including such ideas as the strong network power on the level of network strategy, the network governance on the level of network technique, the network safety, and the network sharing. In the major opportunity of network development, his Internet thinking is beneficial to us in the full use of network sp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Moreover it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us to build a network security system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the view to interconnecting.

Key words: Xi Jin-ping; Internet thinking; information age

【编辑 程广平】

(上接第5页)

On Sun Yat-sen's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u Guo-li

WANG Hai-lin^{1,2}, DONG Si-dai¹

(1. Wuyi University & the Wuyish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United Front Culture in Fujian Province, Wuyishan, 354300,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thinks that it is inaccurate for Xu Guo-li to take Sun Yat-sen's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as that of people-orientation with clear moral values. In fact, it is advisable to understand the thought established by the great m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Being political as it is, the people-orientationism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historical conception. Since Sun Yat-sen believ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e socialism and the cosmopolitanism ar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a same thought, his historical conception should be defined as one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ere are two dimensions on which the people's livelihoodism takes. In reality, it deter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apitalism. Ideally, it embodies the idealism and the moral values more than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Therefore it is out-of-truth to understand Sun Yat-sen's historical conception as the moral idealism. Rather, it should be evaluated scientifically based on the progress of histor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Sun Yat-se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eople-orientation; people's livelihood; two dimensions

【编辑 高婉烟】